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

金雁 秦晖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

金雁 秦晖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 金雁, 秦晖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060-6002-8

I. ①农… II. ①金… ②秦… III. ①农村公社—研究—俄罗斯 IV. ①F35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7299 号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NONGCUN GONGSHE、GAIGE YU GEMING)

作 者: 金 雁 秦 晖

责任编辑: 姬 利 李 烨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2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6002-8

定 价: 49.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你属于谁，亲爱的尼古拉？

属于大地？属于田野？属于村社吗？

属于你们，我的兄弟和孩子，我只属于你们呀！

——俄罗斯民歌《农民与奇迹创造者圣尼古拉的谈话》

俄国是个农夫的国家，俄国社会的整个中坚、俄罗斯大地的全部未来、俄国现在和将来的全部历史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是同农民的利益、生活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

俄国农民在全球的命运中具有世界性意义。

——С·Ю·维特

莫斯科罗斯是个中国类型的国家，不过这一中国不在亚洲而在欧洲。

——Г·В·普列汉诺夫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再版序

1996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农民学丛书》出版了我和金雁合写的两本书，即谈中国“前近代社会”和农民问题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和本书，后者谈的是俄罗斯近代改革与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当时为了避免同一丛书中两书作者重复，我们都在各自作为第二作者的一本书中使用笔名。于是《田园诗与狂想曲》署名秦晖、苏文，而本书初版则署名金雁、卞悟。不过两个笔名都是前已习用的，并非此时首创，学界很多同仁都知道。而且两书的内容也是互相呼应的，形同姐妹篇。后来不少论者也注意到这一点。例如《田园诗与狂想曲》后面部分中使用的农民社会近代化的“普鲁士道路和美国式道路”的说法，就主要是在本书中详加论述的。离开本书，就很难真正理解我们在该书中用这一说法表达的意涵。

两书初版至今已经16年，但是关注者仍然不少。不久前《田园诗与狂想曲》已经再版，因此当东方出版社的朋友建议再版本书时，我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也正如当年俄国人谈论“普鲁士道路和美国式道路”实际上是在讨论俄国问题，我们对俄国问题的研究无疑也有着明显的中国问题情结。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关注本书的读者远远超出了俄国史研究的狭小圈子。有个朋友提到，他在某个场合曾见到一群与俄国研究毫不相干的朋友大谈“斯托雷平式改革”如何如何，他笑道：“是你们把斯托雷平变成了中国知识界

的‘公共话题’。”其实倒未必仅仅我们如此，经历了20世纪“以俄为师”、“以俄为敌”、“以俄为戒”到本世纪初又“以俄为友”的漫长过程，很多中国人对俄国问题的兴趣或多或少都带有“中国情结”。

只是我们也充分注意到，当年俄国人讲的“普鲁士道路和美国式道路”完全是个政论符号，与历史上普鲁士和美国的实际情况并无多少关系，谈论者也并非普鲁士和美国问题的研究者。而我们毕竟是专业搞历史研究的，中国情结可以影响我们的问题意识，但不应该左右我们的事实判断和逻辑判断，乃至以这二者为基础的价值判断。在这几个判断方面，我们的文字都需要经得住专业的和时间的检验，需要对“知识产品的受众”负责。我们尽力做到这一点，如果仍然做得不够好，也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确实在初版后的这些年里，本书中的一些内容不仅作为学术问题引起商榷，而且作为“公共话题”，在中国的改革与转轨进程中也引起了来自不同方向、包括彼此相反的两个方向（所谓的“左”、“右”）的批评。具体的学术问题我们只能另外找地方讨论，但作为公共话题引发的一些批评，在我们看来本书已列举的事实足可以应对，无需另作考证，然而这些批评对理解本书内容及其相关的问题却很重要，所以把我们的回应作为附录放在后面，这是再版唯一增加的内容。

实际上自本书初版以来，我们的一些局部观点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这些可以见于我们后来的文字。但是作为学术史上的记录，本次再版除了改正一些错别字外没有其他修改内容。在此，还要感谢东方出版社和责任编辑李焱女士，很多初版中的错字是她校出的。

秦晖

2012年9月于京北蓝旗营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再版序 / 1

绪 论 “农民模式”还是“反农民模式”? / 1

一、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罗斯 / 1

二、俄国道路的“农民背景” / 3

三、“反农民”还是“农民化”? / 7

四、“农民”与“农民社会”的定义问题 / 12

五、俄国的“农民”与俄国的“知识分子” / 19

第一章 农村公社与“俄罗斯精神”的起源 / 31

一、“诸种文明会聚”的大平原 / 31

二、维尔夫公社与基辅罗斯 / 34

三、“黑乡”、“黑土”与“黑农” / 42

四、从自由米尔到农奴制米尔：“土地公有制”的出现 / 50

五、“公社”的起源与土地重分制的起源

——关于“公社论战”的新评价 / 54

第二章 “公社世界”的鸟瞰（上） / 69

一、土地“公有”，定期重分 / 69

二、连环保与“大锅税” / 74

三、劳动组合与“共耕地” / 76

四、强制聚居与强制耕作 / 83

- 第三章 “公社世界”的鸟瞰（下） / 90
- 一、“村社民主”与“畜群式管理” / 90
 - 二、“集体表象”与村社思维方式 / 103
 - 三、村社“平均”与等级壁垒 / 108
 - 四、农奴制、专制主义与农村公社 / 114
- 第四章 从“要否分家”之争到“如何分家”之争 / 127
- 一、躁动的乡村：离土离乡不离“农”的困境 / 127
 - 二、农奴制改革：第一次“父”夺“子”利 / 139
 - 三、“父不父，子不子”：两次改革之间的村社与时局 / 149
 - 四、1905年革命：“如何分家”之争 / 159
- 第五章 从“如何分家”之争到村社复兴运动：由改革走向革命的村社俄国 / 175
- 一、斯托雷平改革：第二次“父”夺“子”利 / 175
 - 二、“斯托雷平奇迹”：甜头与酸果 / 185
 - 三、走向村社复兴之路 / 195
- 第六章 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上） / 210
- 一、村社的困境与政治——思想界的尴尬 / 210
 - 二、“路标”改变：自由主义的没落 / 215
 - 三、从革命民粹主义到“警察民粹主义” / 227
- 第七章 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下） / 250
- 一、社会革命主义：村社危机与民粹主义复兴 / 250
 - 二、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 / 266
 - 三、“雪崩”在宁静中酝酿 / 284
- 结语与余论 从奇吉林到卢多尔瓦伊：公社传统与俄国历史的怪圈 / 303
- 一、奇吉林事件：向束缚者企求保护的农民 / 307
 - 二、卢多尔瓦伊事件：更强大的“保护”与更严酷的束缚 / 309
 - 三、卢多尔瓦伊之后：极端的“保护”与极端的束缚 / 311

附录 历史的启迪：再谈俄国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并答杨震、吕新雨 / 315

征引文献目录 / 361

（一）中文 / 361

（二）俄文 / 364

（三）西文 / 375

（四）日文 / 378

绪 论

“农民模式”还是“反农民模式”？

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我国革命变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行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梯。

——列宁

一、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罗斯

1991年圣诞节前的一个晚上，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的锤镰星红旗黯然降下，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冉冉升起——以俄罗斯为核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宣告解体。作为20世纪象征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占全世界1/6的这片广袤土地上经过74年实践后，终于告一段落。

苏联的崛起与衰落，堪称为20世纪全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当年美国人约翰·里德题为“震撼世界的十天”所报道的十月革命以及1991年的苏联解体，都给世界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对人类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苏联的解体，人们开始高度关注一个问题，即“前苏联往何处去”。这当然不仅仅是“前苏联人”的问题。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赖于未来，也有赖于人们对另一个问题的答案，这就是“前苏联由何处来”。这

同样是个不仅为“前苏联人”所关注的问题。前苏联的未来有待创造，前苏联的历史则已经结束，历史学家应该对这段历史以及它的源头作出解释，而关心着这种解释的，绝不仅仅是历史学家。

苏联的崛起与衰落是个世界性的事件，而它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又更非“地球村”中的其他住户可比。苏联是我们最大的邻居，也曾是我们最大的老师，曾有过一段时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中国是老少咸宜、上下皆称的信念。从孙中山起，中国的国民党、共产党以至一些地方势力（如新疆盛世才等）都曾狂热地“以俄为师”。后来国民党、共产党人又先后“以俄为敌”，而且是头号大敌。如今，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又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倡导“以俄为鉴”。“以俄为师”、“以俄为敌”和“以俄为鉴”几乎是对20世纪中叶中国人革命、建设、改革三部曲的一个概括。不管是为师、为敌还是为鉴，都首先要求以俄为认知对象。而这种认识又是或者说应该是不断深化的，苏联的解体结束了俄国历史的重要一章，然而在“知俄”的进程中它却应该是揭开了新的一章：对俄罗斯现代化历程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和反思。

有趣的是，当中国人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鉴”的世纪行同时，俄国人的中国观却出现了从“以华为鉴”到“以华为师”的演变。沙俄时代统治者中的“西方主义”改革派经常论证说：俄国如果不发奋图强“赶上欧洲”，就只有沦落为“另一个中国”。当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更认为俄国是个“中国类型的国家，不过这一中国不在亚洲而在欧洲”。^①经过了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之后，如今的俄国却在中国之后搞起了改革，而且在改革中也出现了日益增高的“以华为师”的呼声！中俄两国的命运有如此奇特的纠葛，这当然不是仅以地理上的相邻所能解释的。

80年代的不少国际“苏联学”学者都指出，从沙俄时代起，俄国现代化进程从总体上看与其说与“西方列强”的现代化相类，或者与其说它与谁都不相类，不如说它与今天的第三世界或“边缘”（peripheral）国家的

现代化历程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从许多方面看，沙俄既不能简单地视为“欧洲的落后部分”，也不能视为独一无二的特例，它可以说是今天人们称之为“发展中社会”的那一类国家中的第一个。有的学者还进一步论证说，俄国不仅是第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现象类型中产生危机与革命的头一个国家，而且这类国家也借此第一次认识了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俄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与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今日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永远必须考虑的”。^②

二、俄国道路的“农民背景”

“发展中社会”是个农民的社会，因而发展中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从根本上说也是个农民社会的演进过程。这恐怕是中俄两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的共同之处。因此毫不奇怪，国际苏联学界以“农民俄罗斯”和“俄国农民”为题的著述会如此之多，其最极端者，如美国学者E·R·沃尔夫把俄国革命整个地看成一场“20世纪的农民战争”^③（值得指出的是，他给中国革命也作了类似的定义）；爱沙尼亚裔英国学者T·沙宁则把革命前后的俄国问题都纳入“发展中社会的农民政治社会学”范畴中去加以定义与研究^④。多数学者没有走得这么远，但是从“农民社会”的现代化演进这一角度考察俄苏历史，却无疑是“苏联学”的一个重要的当代特征。

在苏联国内，列宁就曾有过俄国革命是“‘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的联合”的结果之说^⑤。托洛茨基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认为俄国革命是“农民战争”与“无产阶级起义”“相互结合和相互渗透”的产物^⑥。而在1917年，列宁甚至还曾把俄国的“农民性质”当做革命的决定因素来强调：“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我国革命变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行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⑦农民的俄罗斯穷则思变但难

以变好，工业化的西方富而能变但却不甚思变，因此最好是农民俄罗斯发难于先，而世界（其实是西方）无产阶级成事于后。这既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借以自圆其说的理论模式（借助这一模式，当时的许多实用策略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经典理论之间的矛盾似乎可以弥合），也是直至1924年“世界革命”的希望最终破灭以前布尔什维克的实际愿望。

然而在这个愿望破灭后，俄国走上“一国社会主义”之路。那种“一国农民革命引发世界社会主义”的解释模式不再能为现实所用，对“一国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背景的强调与现实生活中对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进攻同步强化，互为表里，使得这样一些说法在斯大林时代逐渐成为正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在国内实现社会主义创造了客观条件”，“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使得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十月革命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最明显的表现”；“俄国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焦点”，以及“俄国资本主义量虽小而质最高（垄断程度及无产阶级集中化程度最高），所以必然产生无产阶级革命”，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对俄苏现代化之路的“农民背景”的探讨自然就无法深入，甚至成为异端邪说了。

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所谓“非斯大林化”或“解冻”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在直到1991年的30多年中几经反复，但斯大林模式走向衰落，其弊端日渐为人们所认识，则是一大趋势。在这一时期，人们对俄苏历史演进的“农民背景”的兴趣日渐增高，并进而延伸到这一背景的经济层面以及文化层面。尤其是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改革后，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断有所突破。60~70年代成名的老专家如B·И·布加诺夫、A·M·安菲莫夫、E·И·印多娃、B·П·达尼洛夫、B·A·亚历山大罗夫等常有新见，70~80年代崛起的学者如Г·A·格拉西缅科、B·B·卡巴诺夫、M·A·莫洛德奇金、П·H·泽里亚诺夫等力作纷陈^⑥。尤其是苏联解体前夕，五卷本的大型著作《苏联农民史》陆续出版，标志着俄苏学界在农

民背景方面的研究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就，同时也意味着这一研究领域一个阶段的结束与新阶段的开始。

综观俄苏学界的农民背景研究，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是从单一的农民史学向多学科全方位的农民研究发展。前苏联科学院心理学所O·И·佐托娃、B·B·诺维科夫与E·B·肖洛霍娃等人的《过去与现在的农民心理特征》（莫斯科1983年）与民族学所M·M·格罗缅科、T·A·利斯托娃等人的《俄国人：家庭与村社生活》（莫斯科1989年）等著作就反映了这种势头。二是研究重点从农民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逐渐转向农民家族、村社、社区的研究，尤其是对村社^①的研究本来在旧俄时代是长项，十月革命后这一研究一度中断，那时的农民只被看做是私有制下一系列“阶级”，如“农奴”、“富农”、“贫农”等的合称。直到70年代，苏联学界才又出现了“公社热”。

1970~1974年苏联召开的第12、第13、第14与第15届东欧农史国际讨论会都讨论了“公社史”问题，其中第14届会议更以“农民居民中的公社组织”为题开了专题会议。1971年П·Ф·拉普京的回顾性著作《19世纪后30年至20世纪初俄国历史编纂学中的公社》和1976年《东欧农史年鉴》第6卷《俄国公社史问题》的问世，也对“公社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时期苏联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变化可以从三版《苏联大百科全书》“公社”（Община）这一词条看出：在1939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版“公社”这一词条对十月革命后的公社全然不置一词，对沙俄时代的公社则极力强调其只是“形式上”的东西（言外之意即无损于“私有制”），主要执行的是“征税的职能”。^②到1954年《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时，则声称公社的问题已经由十月革命“从根本上”解决了^③。而1974年第3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由著名学者B·П·达尼洛夫夫妇合著的该词条长达万余言，征引文献多至38种，其中突出强调了传统公社与农业集体化之间的联系，提出了“社会主义对传统公社的利用”的

问题^②。

在许多论文和散论的基础上，1976年，苏联学界关于传统农村公社的第一部专著B·A·亚历山大罗夫的《俄国农村公社：17世纪至19世纪初》问世，此后讨论“公社问题”的作品接连不断，如E·H·巴克拉诺娃的《俄国北方的农户与公社》（1976年）、И·А·布雷金的《17世纪至20世纪初西伯利亚农民公社》（1977年）、Л·С·普罗科菲耶娃的《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的俄国农民公社》（1981年）、B·B·卡巴诺夫的《十月革命与农民公社》（1984年）、Г·А·格拉西缅科《农民反对斯托雷平土地政策的斗争》（1985年）、B·Д·沙罗夫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马里边区的农民公社》（1986年）以及П·H·泽利亚诺夫的《1907~1914年欧俄农民公社》（1992年）等。

至于海外白俄学者与欧美、日本学界，对村社问题一直就比较关注，70年代以后更是如此。著名白俄史学家С·普什卡列夫一生专攻村社问题，他多年来的成果汇编为《俄国农民的重分型土地公社》一书于1976年在美国出版，该书把19世纪“村社论战”以来“国家学派”自B·H·契切林起几代学者的研究加以总结发挥，引起很大反响。欧美学者推出的重要成果有：D·J·麦尔的《集体化前俄国农民组织，1925~1930年的公社与村会研究》（1971年），G·雅内的《强迫动员，1861~1930年俄国的农业改革》（1982年），D·阿特金森的《俄国土地公社的终结，1905~1930年》（1983年）以及T·沙宁的《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国》（1985年）等。就连“苏俄学”研究一向在世界上没有什么重要地位的日本，70年代以后也形成了“公社热”，先后出现了保田孝一、林道义、铃木建夫、日南田静真、荒田洋和雀部幸隆等人的著述^③。

随着研究的深入，实证研究中的“村社论战”在各国自70年代相继展开。在欧美，1974年出现了英国学者K·W·戴维斯与D·J·麦尔和美国学者维松之间就村社与集体农庄之间是否存在“物理地理学上的同一

性”（physicalgeographical identity）展开的论战。在日本，林道义、雀部幸隆与日南田静真等人为俄国村社中“实质平等”色彩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色彩占优势以及它们各自对革命起了何种影响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苏联，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有一批学者突破了传统理论框框，如Л·В·阿拉耶夫与Ю·Г·阿列克塞耶夫提出了村社是国家为专制集权目的建立的，而不是原始时代的遗存或残余因素，村社产生以前是私有制而非“原始公有制”的看法，并得到了80年代以И·Я·弗罗雅诺夫为代表的、主张俄国历史上在封建专制时代之前存在着古典公民社会的“列宁格勒学派”的间接支持，同时却引起了苏联大多数学者，包括几乎全部主要学术权威的激烈批评。这场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19世纪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在村社问题上“自然遗存论”与“国家创建论”大论战的翻版，但其话语系统，知识谱系与论战背后的社会内涵则有鲜明的时代性。

有趣的是，不管是欧美、苏俄还是日本，人们口头上争的是村社，心中想的是现实，无怪乎在这一时期美国的D·阿特金森、日本的保田孝一与林道义以及苏联的B·B·卡巴诺夫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先后写了同以“俄国革命与农民公社”为题目的著作^④。

三、“反农民”还是“农民化”？

然而，无论在苏联国内，还是国际“苏联学”界，在对俄苏现代化之路的“农民背景”的探讨深入之后便分别向两个方向发展，而这两个方向却构成了越来越明显的悖论：即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感到斯大林模式的城市本位、工业本位色彩畸重，“改造”农民、剥夺农民、歧视农民和以农民为“原始积累”的牺牲品的做法十分严酷；另一方面，人们也越来越觉得这一模式的前近代背景、落后背景以及前工业社会、传统社会与农民社会的背景浓郁，与马克思乃至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等人设想

的图景大相径庭，“农民俄罗斯”的影子隐然在焉。一方面，人们纷纷指出布哈林等人因“亲农民”的主张而罹难，恰亚诺夫等党外专家因被指为“劳动农民党”而受到镇压，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地区后当地的农民党也被扫除，而据说是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思潮，更是自普列汉诺夫以来就被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视为邪说，苏联时代也动辄拿民粹主义，“新民粹主义”或“民粹主义残余”开刀；另一方面，人们也频频指出斯大林、加里宁等人早年生活的乡村背景以及与此相反的，从普列汉诺夫到布哈林的城市贵族精英与西化的侨居者背景，指出1914~1921年战争（世界大战与内战）造成经济中现代成分的崩溃、城市的萎缩以及工人参军、提干、死亡、回乡而导致的“无产阶级消失”和“社会农民化”的影响，指出斯大林时代在另一种机制下膨胀起来的城市中居民、工人、干部的农民来源，指出斯大林体制反市民文化（不仅仅反资产阶级）、反犹、反个性等“农民特点”……

于是，无论在苏联国内还是在国际学界，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在非马克思主义者中，这两个方面的论述都导致了“解释的冲突”。一方面，在苏联国内从60年代以来就流行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根源”分析法为模式的“斯大林主义小资产阶级基础论”，这个说法到戈尔巴乔夫“体制内改革”高潮的80年代末盛极一时，许多论者认为，“在老工人阶级不断被削弱的同时，新工人阶级的数量在30年代初获得迅速增长。他们主要来自农村，带有浓厚的小农意识”，“农民的崇君心理根深蒂固”，“国民普遍存在小资产阶级性，斯大林主义正是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心理。”^⑤这种说法最极端的形式如前苏联哲学家И·克利亚姆金所言。他认为斯大林主义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无关，甚至与托洛茨基也无关，“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只是失衡的宗法农民头脑发热的产物”^⑥。而不那么狭隘的说法则把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的言行乃至苏联以外的所有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弊病都与“农民性”联系起来。类似的论点在苏联国外和非马克